



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馆刊

第8号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主 编：张战武

副主编：萧国梁 夏佑新

编 辑：夏佑新 吴 波 陈新征



目 录

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研究

- 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到广州……………陈登贵(1)
- 2、毛泽东与中共三大……………王国政(7)
- 3、毛泽东与上海早期革命统一战线……………任武雄 陆米强(12)
- 4、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讲所的伟大实践……………陈登贵(28)
- 5、毛泽东与大柏地战斗……………杨荣彬(37)
- 6、“朱毛”——红军胜利的旗帜……………萧盛书 杨 恢(39)
- 7、危难真情
——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井冈情谊……………胡卫华 许筱凤(45)
- 8、也谈青年毛泽东究竟缘何没有出国勤工俭学……………李 潇(50)
- 9、青年毛泽东与一代报人邵飘萍……………若 昕(53)
- 10、毛泽东与毛贻全……………邵季胜(63)
- 11、毛泽东致方觉民信的有关背景材料……………方允臧(67)

毛泽东思想研究

- 1、论毛泽东的科技价值观……………夏佑新(70)
- 2、试论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和方法运用……………黄忠优(79)
- 3、浅析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刘丽丽(89)
- 4、安生之本,必资于食
——毛泽东自我保健初探(四)……………伍昆性(98)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到广州

陈登贵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到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他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培育革命干部,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进行了艰辛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次

192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为制定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大会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具体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国民党的阶级性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国共合作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三是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左”和右两种倾向。毛泽东、李大钊、向警予等态度鲜明,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二大”和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的与国民党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以及共产国际1923年1月12日《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主张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要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与会代表罗章龙回忆说:“在中共‘三大’上,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重要作用。”(见1972年12月《罗章龙关于中共三大问题谈话纪要》,存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这次大会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

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在这次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经常到东山简园湘军司令谭延闿住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

在中共“三大”会上，毛泽东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阶级也很重视。他以湖南工农运动的经验和历史上农民斗争的事例，阐明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强大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任何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类局面。”这种见解显然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贡献。因此这次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保护农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也明确写道：“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在党的“三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市东山区新河浦路“春团”召开三届一次会议，会议通过协商选举了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兼组织部长，罗章龙为会计，参加主持全党的日常工作。1923年9月初，党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往上海，毛泽东随党中央机关到上海，为贯彻中共“三大”制定的方针政策而工作。

第二次

1924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毛泽东以国民党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之一。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蓄意攻击共产党，提出

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写进国民党章程。共产党人李大钊即在大会上发言，阐述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方瑞麟的谬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也反对方瑞麟的主张。毛泽东抓住赞成国共合作呼声高的有利时机，适时提出停止讨论，“付诸表决”（见1924年1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录》）。毛泽东的意见被大会采纳，进行大会表决，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大会在讨论选举制度的问题时，国民党加拿大支部代表黄季陆提议国民党要采取比例选举制，毛泽东果断地反对，指出“现时比例选举制度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有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见1924年1月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共产党人宣中华、李立三也相继反对黄季陆的提案。结果，大会没有把这个提案付之表决。这场斗争说明了毛泽东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的主持领导下，经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国民党党纲等多项决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选举了有10名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有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沈定一等。谭平山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三名常委之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使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的到来创造

了条件。

会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第三次

1925年2月起，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6月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反动阶级的恐慌，便下令追捕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按：统治湖南的封建军阀）派军队来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35页、三联书店出版。）

1925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广州。当时广州是全国的革命中心，省港大罢工如火如荼。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以后，农民运动更是蓬勃发展。革命政府已进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已取得了胜利，并在5、6月份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叛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到广州后，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0月5日他上任后，便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和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动决议，并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毛泽东立即与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联名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创刊,毛泽东担任该刊物的主编,亲自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庄严宣告:“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还撰写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最大的本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战斗檄文,深刻揭露了“西山会议派”是适应了帝国主义需要,“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反动本质,并强调了必须与“西山会议派”进行针相对的斗争,直至把他们从革命营垒中清除出去。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期间,共产党人沈雁冰、萧楚女、杨开慧、张秋人也先后协助他编辑此刊物。《政治周报》每期发行4万份,销往全国和海外,影响巨大,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周报》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终于把“西山会议派”的主要分子开除出党。在国民党“二大”会上,毛泽东仍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广州宣告成立,由毛泽东、林伯渠、阮啸仙、萧楚女等9人组成。同年3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了“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以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续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鉴于毛泽东当时注意研究农民问题,对发展农民运动有独到见解,曾在第五届农讲所担任教员,又有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国民党中央决定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过毛泽东等的积极筹备,加上国民党的大力支持,第六届农讲所于1926年5月3日在广州惠爱东路番禺学宫开办。周恩来、彭湃、萧楚女、阮啸仙、周其鉴、恽代英、于树德、张秋人、李立三等担任教员。学员共327人,来自20个省区。这

届学员人数多,影响大。毛泽东除担任所长,处理所务工作外,还兼任教员,亲自给学员教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便是《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程的第一章。周恩来教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彭湃教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萧楚女教授《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课程。

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吸收了前五届农讲所的经验,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组织学员学习革命理论,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组织学员参加社会重大的政治活动和到农村实习,还组织学员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来自不同省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36个调查项目,让学生专门研究各省的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和农运状况。培养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组织学生到当年农民运动搞得好的海丰农村实习,学习农运经验,坚定学员从事农运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还将教员、学员调查研究的成果和从国内外搜集到的有关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的材料及文献,汇编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他亲自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套丛书共出版26种,是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

第六届农讲所于9月11日结业,该届教员学员服从革命斗争需要,奔赴全国各地从事革命斗争。他们在各地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举办农讲所和农训班,培育革命干部,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投入了新的战斗。

(作者: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

毛泽东与中共三大

王国政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国民党等党派和政治团体采取排斥攻击的态度，经过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至二大时，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转变，表示可以与之进行党外合作。然而，孙中山并不同意两党实行“党外合作”。1922年8月，中共召开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初步形成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认识，具体方案，则要与孙中山商量，待中共三大讨论后决定。1923年2月，由中共领导并发起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工人血洒京汉路，使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自己力量的不足，从而加速了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的步伐。此时的孙中山，经历了自己心腹将领陈炯明的武装叛乱，意志消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下，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转变，认识到国民党要增加新血液，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彻底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才能得到新生，革命才有希望。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组了大元帅府，准备改组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立即提到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

早在1922年底，中共高层着手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24日，毛泽东给张秋人的信里说到：“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①甫先生指的是仲甫先生陈独秀，大考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称。3月7日，毛泽东复信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信中建议，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应改在中共三大之后为宜，以相统一。^②4月，中共中央调毛泽东到上海，协调组织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初，毛泽东提前来到广州，同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住进东山新河浦“春园”，讨论和起草三大

的有关文件。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山区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谭平山等30多人，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其中有表决权者19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毛泽东以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6月12日上午，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隔天讨论陈独秀的报告。陈独秀在报告及其以后的发言中同意共产党作为整体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本来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共其他领导同志的劝说，至中共西湖会议，他才有条件地勉强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参与《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对参加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1923年“二·七”大罢工遭到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陈独秀的思想由此变得悲观消极，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③至于农民阶级，陈独秀更为轻视，“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但是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④中国“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⑥“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⑦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与国民党合作，目前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待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胜利以后，再去搞无产阶级革命。

张国焘却是另一种意见。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反

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西湖会议以来，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他认为国民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如果加入，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混合，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三大会议上，多次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张国焘的左倾关门思想，也不同意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消极思想。毛泽东主张，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给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通称“一月指示”），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他针对陈独秀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轻视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观点，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以1922年长沙第一纱厂和1923年京汉铁路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有力量的。毛泽东说：“‘二·七’罢工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二·七’罢工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影响是主要的”，^⑧“二·七”罢工后，“安源工人运动继续发展，有小莫斯科之称”。^⑨他还谈了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矿工人斗争的情况。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大会所接受，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

针对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轻视农民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他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应

特别注意农民运动。”^⑩毛泽东发言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央“不应只看见局处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⑪因而他得出结论:中国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毛泽东的这种远见卓识,就连后来叛逃到国民党的张国焘事隔三十年后还是大为叹服:“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贡献……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⑫大多数代表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通过了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明确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农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加速革命发展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策略。三大代表罗章龙回忆说:“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小组讨论会,是毛泽东主持的,我是参加了。对于没收地主的土地问题,毛泽东一早就提出来了。但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地主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是大地主多,有些地方是中小地主多。因此,大家对关于没收地主土地问题展开了争论,最后还是将土地问题写进《农民问题的决议案》。”^⑬

开会期间,毛泽东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拜会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谭延闿等,同他们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

三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此次选举,共产国际曾有指示,要多选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湖南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⑭经过投票,大会

选出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本党内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最早进入中央领导层应该由此起。

中共三大于6月20日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同样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决定在保持自己组织和思想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运动。这次大会为随后的国共合作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准备。毛泽东事后对中共三大作了这样的评价：“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的革命运动的规模。”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1923年1月24日。

②《毛泽东年谱》(上卷)1923年3月7日。

③④⑤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载《前锋》第2期。

⑥⑦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载《向导》第22期。

⑧⑨⑬《罗章龙关于共三大问题谈话纪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旧址调查小组访问罗章龙记录。

⑩徐梅坤《参加中共三大》，载《革命史资料》第8辑。

⑪⑫张国焘《我的回忆》第六编第二章。

⑬北京《晨报》1922年12月23日。

⑮埃德加·斯诺《西生漫记》第四篇第四章。

(作者：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

毛泽东与上海早期革命统一战线

任武雄 陆米强

革命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广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不久，毛泽东就身体力行，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上海也留下了他谱写的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在三曾里中央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来沪参加会议，因找不到会址，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大会的精神。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为实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必须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以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由于当时孙中山也决心要联俄联共，欢迎共产党人和他合作，提出“党内合作”的意见，并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为此，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形式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赞同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大会最终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党的“三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陈独秀、蔡和

森、罗章龙、谭平山 5 人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兼任中央局秘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党的“三大”后，毛泽东随党中央机关迁来上海，和党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一起，竭尽全力，积极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他作为中央局秘书，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委员长陈独秀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会议记录、管理党内文件，以及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工作。并担任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编委。

党的“三大”后的中央局机关旧址，当年就设在闸北三曾里 3 号。三曾里是普通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是位于公兴路与香山路（后改称象山路，今临山路）交叉处的一条小弄堂（现此处已建造数幢五层楼公房）。当时因考虑此地属华界地段（中国地界），与租界毗连，一旦遇一方搜查，便于撤离至另一地界。此地又处北站附近，外地来沪联系工作的党内同志下火车后容易找到。另外此处附近还有一些缫丝厂和手工业厂，十分便于开展与工人的联系。故在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勘察后，由他经手租下这所房屋，作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点，陈独秀与王荷波不住在这里。

当时，中央局负责人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和中央妇女部负责人向警予都住在这里。毛泽东住在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下后厢房，罗章龙住在楼上。三户人家，自称为“三户楼”。为了隐蔽起见，由向警予作户主，以“报关行”作为职业掩护。毛、蔡、向、罗 4 人都是湖南人，早年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早已熟识，现住一起，更亲如一家，亲密无间，同甘共苦，共同战斗。此外有一个叫王熙春的女共青团员掌管事务工作。还请了一个娘姨，料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有严格的纪律，即不准擅自到街上就餐、看戏、照像和闲逛等，以防不测，外地来的人必须先经中央接头处报到接洽后才可以再来。中央局委员开会、办公均在楼上，客堂作一般会客和休息用。毛泽东和蔡和森作为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编委，经常在此夜以继日地审阅各种文稿，草拟文件、决议，为《向

导》等刊物撰文，并积极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时事，毛泽东每天早晨利用吃早饭的时间阅读各种报刊，把重要的内容加以记录或剪贴。他还特别关心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各阶层的政治动态。陈独秀和其他人来时，他们就经常一起谈论政治时事与党务工作问题。

罗章龙回忆说：“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改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罗章龙有诗记述三户楼：

黄浦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荡神京。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①

二、“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

党的“三大”后，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在广州时曾经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等一起两次拜访过廖仲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②以后他随党中央机关自广州迁来上海，又进一步贯彻党的有关决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923年7月11日《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发表了毛泽东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唯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毛泽东阐述了联合战线在革命中占极端重要的地位，中国是深受帝国主义压迫